

# 誰最有創造力？——中、德、美三國大學生的調查及思考

岳曉東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本研究在香港、南京、德國和美國的大學中取樣調查分析，檢驗不同文化形態下的大學生對創造力及其代表人物認知上的差異。研究發現中國學生（以南京學生尤甚）多提名政治家和科學家；德國學生多提名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傑出人物；而美國學生則多推崇政治名人，其次推崇藝術家，其他領域的提名也較為均衡，比例高於中國學生。兩種不同文化下的認知範式印證了文化對創造力認知的影響：東方社會看重創新行為的實用性及社會貢獻，存在著業績顯著性效應；西方社會看重創造力的多元表現形式和創新思維能力，存在著審美顯著性效應。

關鍵字：創造力、業績顯著性、審美顯著性

## 前言

### 中西文化對創造力及其代表人物的認知差異

創造力範疇指個人創造新事物、新概念、新產品的能力（岳曉東，2000a）。創造力的大小不僅受遺傳因素影響，也受文化環境影響（Csikszentmihalyi, 1999; Weiner, 2000）。一個人從幼兒成長為青年，他所經歷的文化薰陶將對其創造力品質打上深深的烙印。文化既是人的生存環境，也是人的創造力發展的空間。然而，不同地區的文化對創造力的理解與培養也是不盡相同（Amabile, 1996; Ludwig, 1992）。因此，對於創造力的認識與界定，需在文化的大範疇內進行討論。

近年來，有關創造力認知之文化作用的研究表明，東西方文化對創造力的認知存在著某些原則性差異。具體地說，西方人對創造力的理解建立在個人主義價值觀（individualistic values）基礎之上，注重表達個體的自由意志和原創力（見Amabile, 1996; Mayer, 1999）。這種理解根植於西方文化之追求自由、人權和民主的理念中（Weiner, 2000）。由此，創新的多樣性與個性化表現得到了大力倡導，那些在詩歌、戲曲、音樂、美術、雕塑、哲學等領域有發散性思維、獨創性作品的人物成為具有創新精神的代表（見Baer, 1997; Sternberg & Lubart, 1999）。據英國一項對天才人物認知的調查顯示，著名藝術家、音樂家、科學家為英國大學生所推崇的天才人物，其中包括愛因斯坦、牛頓、莫札特、達芬奇、莎士比亞等人，政治人物絕少受到推崇（Smith & Wright, 2000）。另據一項波蘭的調查表明，波蘭大學生主要提名著名哲學家、音樂家、藝術家及科學家為創造力的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卻不是很受重視（Tokarz, Beauvale, Zyla, & Rudowicz, 2004）。這種對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的重視體現出兩種顯著特徵：一是甚強調審美性、藝術性、獨創性、幽默感等因素的審美顯著性（aesthetic salience）偏向，二是甚強調把在上述領域做出的創新成果作為評判個體是否具有創造力的基本標準（Cropley, 1992; Helson, 1988; Runco & Bahleda, 1987; Sternberg, 1985）。

與此相反，中國人對創造力的理解建立在集體主義價值觀（collectivistic values）基礎之上，注重道德規範和政治規範的制衡作用（Wu, 1996），並缺乏審美觀和幽默感等因素（見 Rudowicz & Hui, 1997; Rudowicz & Yue, 2000）。這種理解根植於中國文化中的知識功利主義（intellectual utilitarianism）（岳曉東、賀國強，2002）。它可謂是一種對知識資訊及其用途之價值判斷的實用主義傾向，突出表現為對於知識的追求重內容過於重形式，重成效過於重結果。在中國社會中，知識功利主義的形成是多種社會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當中包括儒家思想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中國社會之「官本位」的主導思想，中國人對權威人物的傳統崇拜與順從及中國人的社會中心取向等因素的作用（見楊中芳，1999；楊國樞，1981；Chan, 1997; Wu, 1996）。針對這一現象，岳曉東提出，中國人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存在著某種「業績評估偏向」（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岳曉東、賀國強，2002; Yue, 2003, 2004），它使得人們在看待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表現及其成果時，多從其個人業績或社會影響的角度來加以判斷，形成認知上的某種偏向或定勢作用。岳曉東（Yue, 2004）還用「誰有影響力誰就有創造力（Whoever is influential is creative）」這一形象比喻來概括這種文化認知模式。

為了檢驗「業績評估偏向」在中國人對創造力代表人物認知上的影響，岳曉東（岳曉東2000a, 2000b；Yue, 2003, 2004）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調查了香港、北京、南京、蘇州、廣州、台北六地中國大學生對古今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結果表明，中國大學生在提名創造力代表人物時，均首推政界名人，次推科技界名人，並很少提及藝術界等領域的名人，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學生的提名中尤為明顯。此外，中國大學生在給所提名人物的創造力度與社會貢獻度評分時，對政治家與科學家的社會貢獻度評分要普遍高於對其創造力度的評分；對藝術家與作家/詩人的創造力度評分要普遍高於對其社會貢獻度的評分。這突出說明，中國人在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上，的確受「業績評估偏向」的影響，表現出甚注重業績顯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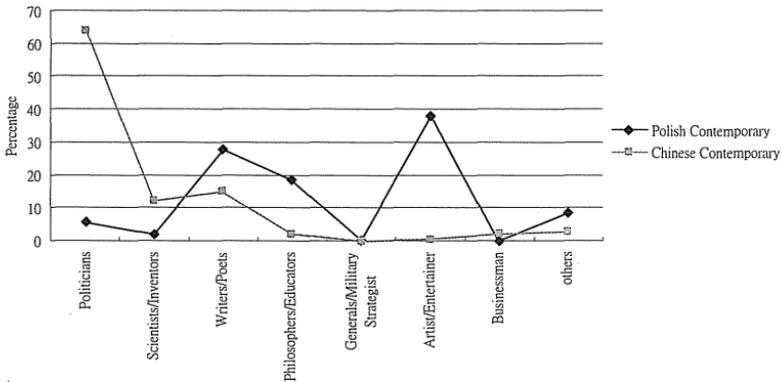
(meritorious salience) 的特徵，即看重創造力的社會影響及業績表現（岳曉東、梁覺，2003）並崇尚傳統，講究繼承，強調創新與傳統的和諧統一（Averill, Chon, & Hahn, 2001; Li, 1997; Lubart, 1999）。換言之，業績顯著性可導致人們在看待創造力成果及其代表人物時，首先考慮到其個人業績或社會影響，然後再考慮其創造力本身的表現。

### 中西文化對創造力之審美顯著性與業績顯著性的偏重差異

綜上所述，中、西方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差異可以突出表現為對創造力之審美顯著性與業績顯著性的對比差異。在這裏，審美顯著性泛指對創造力認知中偏重其審美性、藝術性、獨創性的傾向（Cropley, 1992; Helson, 1988; Runco & Bahleda, 1987; Sternberg, 1985），而業績顯著性泛指對創造力認知中偏重其社會貢獻、社會影響、社會評價的傾向（岳曉東、梁覺，2003；岳曉東、賀國強，2002；Wu, 1996; Yue, 2003, 2004）。據此，具有審美顯著性的創造者主要包括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哲學家、演員、導演等類人物，其共性特徵是具有突出的個性特徵與獨創表現。另一方面，具有業績顯著性的創造者主要包括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企業家等類人物，其共性特徵是具有突出的社會影響與歷史地位。這種對比本質上也反映出中、西方之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差異（見 Hsu, 1981; Rudowicz, 2003; Sternberg, 1985; Yue & Rudowicz, 2002）。

Tokarz, Beauvale, Zyla, & Rudowicz等人（2004）曾結合岳曉東的資料（Yue & Rudowicz, 2002）製作了一張中國、波蘭大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提名的對比圖（見圖一），在圖中，中國大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呈現了一幅單峰圖，即，提名都集中在政界、學界的名人上，而波蘭大學生的提名則呈現出另一幅單峰圖，即提名都集中在文學界、藝術界的名人上。這一雙峰圖突出體現了中、波大學生在對創造力代表人物提名上的業績顯著性與審美顯著性的對比。Rudowicz和Hui的研究亦證實了這種對比差異的存在，他們發現，北美學生相對於香港學生，更多地將創造力與藝術、美學上的成就

圖一 中國與波蘭大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差異



結合起來，而香港學生則更多地將創造力與金融、政治上的成就相聯繫（Rudowize & Hui, 1997）。

### 本研究的目的是與假設

迄今為止，絕大部分的跨文化研究都集中在論證東、西方學生對創造力測試的優劣性比較（見Jellen & Urban, 1989; Ng, 2001; Ripple, 1989），而絕少有研究深入探討不同文化模式是怎樣導致人們對創造力及其代表人物的認知差異。據此，本作者完成了此項中、美、德三國大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跨文化調查，旨在（一）進一步驗證筆者以往的研究發現及其文化歸因；（二）檢驗審美顯著性與業績顯著性對中西方大學生在創造力代表人物認知上的差異。由此，本研究有兩項基本假設：

假設一：在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上，中國學生提名具有業績顯著性的人物比例將大於具有審美顯著性的人物比例，反之，西方學生提名具有審美顯著性人物的比例將大於具有業績顯著性人物的比例。

假設二：由於香港較中國大陸更受西方社會的影響，中國大陸學生提名具有業績顯著性的人物比例將高於香港學生的提名比例；香港學生提名具有審美顯著性的人物比例也將高於中國大陸的提名比例。

## 研究方法

### 被試者

研究分別在香港、中國大陸、德國和美國各選一所大學，分別取樣，共取得128名香港大學生、143名內地大學生（南京）、161名美國大學生（Mankato）和166名德國大學生（Giessen）的樣本。在選擇這四地的大學生樣本時，研究者充分考慮了各所大學在環境、師資條件、知名度和學生生源方面的可比性。

### 測量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問卷要求受訪者填寫出三名最具有創造力的本國人與外國人，並具體指出其突出的創造力表現。值得強調的是，指出提名者的創造力表現，是為了確保受訪者在提名時不以媒體渲染的知名度為依據，而是實實在在地根據其成就、能力、魅力或功績來提名（岳曉東、賀國強，2002; Yue, 2003, 2004），從而最大限度的避免「誰名氣大、曝光多，誰上榜」的情況。還值得強調的是，為避免中港兩地受訪者在閱讀理解的差異，南京受訪者的問卷用簡體字印刷，香港受訪者的問卷用繁體字印刷。對於個別兩地意義不完全一致的詞語，問卷做了特別調整，並請有關專家做了互返翻譯（back translation）。

### 資料處理

對於所得資料處理，筆者採取了如下步驟：（一）將所有的提名人物及其提名原因全部輸入資料庫；（二）將這些提名人物進行分類，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作家/詩人、哲學家/教育家、藝術家/音樂家、軍事家/將軍、企業家、演藝明星、體壇明星、英雄人物、其他名人（如宗教人物、卡通人物等）、非名人（如父母親、兄弟姐妹、同學、好友、親戚、老師等）及不明人物等，分類先與一位研究助手分別鑒別，然後再一同匯總；（三）當在分類過程中出現分歧時，筆者會尋求第三者、甚至第四者的意見，以最後確定

其屬性；比如，許多被提名人物屬於不同職業的名人，在此情況下，他們均以其更知名的職業來鑒定，沒有一位提名人物被重複輸入；（四）分析並聚合提名原因，並在此基礎上判斷該被提名人物的審美顯著性/業績顯著性的從屬。比如，歌德作為詩人、自然科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政治人物，在上述領域都有著傑出表現，且其在歷史上的社會影響力也一直為人津津樂道。在此情況下，進一步分析提名原因後發現，絕大多數被訪者均以歌德文學上的光芒作為提名原因，因此將其劃入審美顯著性的範疇；（五）將分類結果通過適當的圖表表現出來（岳曉東、賀國強，2002; Yue, 2003, 2004）。

## 研究結果

### 中、德、美三國大學生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差異

表一 四地大學生提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類型對比

	Giessen (德國) (n = 166)	Mankato (美國) (n = 161)	香港 (n = 128)	南京 (內地) (n = 143)
業績顯著性				
政治人物	14.95%	73.20%	34.00%	44.30%
科學家	18.69%	7.00%	25.70%	30.40%
軍事家	0.71%	0.70%	0.80%	1.20%
商人	1.40%	1.40%	2.50%	2.20%
審美顯著性				
藝術家／藝人	28.27%	8.50%	11.90%	2.50%
作家／詩人	28.27%	1.70%	14.40%	11.40%
哲學家	6.07%	—	8.00%	6.20%
其他	1.64%	5.10%	1.90%	1.00%
非名人	—	—	0.30%	—
未能辨別者	—	2.40%	0.60%	0.70%

註：1. 這裏的百分比是按照所有被提名人數之總和來計算的。

2. 各列百分比相加之和為100%。

3. 許多被提名人同時隸屬於不同的職業，在此情況下，他們均以其最知名的職業來鑒定，沒有一位名人的名字被重複輸入（如諸葛亮既是政治家，也是軍事家。但諸葛亮在中國歷史上更以政治家為人稱道，所以他被歸入政治家的範疇）。

4. 文中表三註釋與表一相同。

表一展示了四地大學生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對比，發現值得注意的有下列：（一）美國學生心目中的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絕大多數是政治人物，佔73.20%，這一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三個地區對政治人物的提名。排在其次的為藝術家和科學家，分別佔8.50%和7.00%；（二）德國學生心目中的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主要為藝術家和作家／詩人，分別佔28.27%，其次為科學家，佔18.69%，而對政治人物的提名只佔14.95%，為四個地區的最低值；（三）香港和內地學生心目中的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則主要為政治家，分別佔34.00%和44.30%，科學家／發明家分別佔兩地提名的25.7%和30.4%。兩地提名中的最大差別在於內地學生對政治人物和科學家的關注明顯高於香港學生，而香港學生對藝術家的關注（11.90%）顯著高於內地學生（2.50%）。

在表二，四地大學生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前十位提名中，政治家明顯佔主導地位，其次為科學家及文學家。就本研究所調查的美國學生而言，首十位元創造力代表人物全部為政治明星或者人權鬥士，以林肯、甘乃迪、華盛頓為代表的美國歷屆政績出色的總統和以馬丁·路德·金、羅莎派克為代表的人權運動中的傑出領袖皆榜上有名；就德國學生而言，歌德、貝多芬等藝術家是德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且總提名大於以歷史上的鐵腕總理俾斯麥為代表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提名也相當的高，達到了11.19%，排在第二位；就香港學生而言，孫中山、蔡倫、毛澤東、高錕等人是中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就內地學生而言，鄧小平、毛澤東、秦始皇、畢昇等人是中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這其中，內地學生對具有業績顯著性人物的總提名（49.37%）明顯高於香港學生（37.58%），而香港學生對具有審美顯著性人物的總提名（14.64%）也高於內地學生（5.68%）。此外，鄧小平、毛澤東、秦始皇三人同時被兩地學生提名，可見他們對中國社會影響力之深遠。

四地學生對前十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總和均接近或超過了總提名的半數，其中德國學生樣本為47.54%，美國學生樣本為

表二 四地大學生最多提名首十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對比

	Giessen(德國) (n = 166)		Mankato(美國) (n = 161)		香港 (n = 128)		南京(內地) (n = 143)				
	排名	百分比	排名	百分比	排名	百分比	排名	百分比			
愛因斯坦	2	11.19%	馬丁·路德·金	1	24.40%	孫中山	1	06.91%	鄧小平	1	14.07%
俾斯麥	4	2.56%	林肯	2	9.90%	蔡倫	2	6.35%	毛澤東	2	11.36%
科爾	6	2.33%	甘乃迪	3	6.52%	毛澤東	4	5.52%	秦始皇	3	6.17%
馬丁·路德	8	1.86%	華盛頓	4	5.56%	高錕	5	5.26%	畢昇	3	6.17%
阿登納	9	1.63%	羅莎派克	5	4.11%	鄧小平	7	4.97%	祖冲之	5	3.70%
希特勒	9	1.63%	克林頓	5	4.11%	秦始皇	8	4.70%	袁隆平	7	2.96%
業績顯著性	—	—	小布殊	7	3.62%	何大一	9	3.87%	周恩來	8	2.72%
	—	—	小羅斯福	8	3.38%		—	—	華陀	10	2.22%
	—	—	麥爾坎·X	9	2.42%		—	—		—	—
	—	—	愛迪生	10	2.17%		—	—		—	—
總數		21.20%		66.19%		37.58%		49.37%			
審美	1	16.32%		—	李白	3	5.80%	孔子	6	3.21%	
貝多芬	3	5.13%		—	孔子	6	5.25%	魯迅	9	2.47%	
巴赫	4	2.56%		—	金庸	10	3.59%		—	—	
席勒	6	2.33%		—		—	—		—	—	
性	—	—		—		—	—		—	—	
總數		26.34%		—		—	—		—	—	
5.68%									14.64%		

註：表中的百分比數是按總百分比數來計算的。

66.19%，香港學生樣本為52.22%，內地學生樣本為55.05%。這說明通過分析排名前十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是具有信度的。

總之，在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上，本研究的假設一得到了部分驗證，即德國學生較之中國學生更傾向於將創造力與藝術上的突出成就聯繫起來，而美國學生對本國政治明星的偏愛與假設一不相符合；而本研究的假設二則得到了充分的驗證，香港學生較之內地學生會更多的提名具有審美顯著性的人物為創造力的代表。

### 中、德、美三國大學生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差異

表三 四地大學生提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類型對比

	Giessen (德國) (n = 166)	Mankato (美國) (n = 161)	香港 (n = 128)	南京 (內地) (n = 143)
業績顯著性				
政治人物	17.54%	39.40%	5.80%	7.10%
科學家	18.00%	11.10%	42.10%	51.90%
軍事家	1.14%	11.80%	2.80%	3.60%
商人	4.56%	0.40%	10.80%	8.30%
審美顯著性				
藝術家／藝人	42.14%	13.60%	20.20%	7.30%
作家／詩人	13.21%	2.20%	5.00%	2.80%
哲學家	3.19%	3.20%	7.50%	14.70%
其他	0.23%	15.80%	5.50%	4.00%
非名人	—	1.10%	—	—
未能辨別者	—	1.40%	0.30%	0.20%

表三展示了四地大學生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對比，其中下列發現值得注意：（一）美國學生心目中的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絕大多數依然是政治人物，佔39.40%，其次為其他類別和藝術家，分別佔15.8%和13.60%；（二）德國學生心目中的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主要為藝術家，佔42.14%，這一比例遠遠大於其他三個地方的提名。科學家和政治家分列其後，分別佔18.00%和17.54%；（三）香港學生心目中的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主要為科學家／發明家，佔42.1%，其次是藝術家／藝人，佔提名的20.20%；（四）內地學生心

目中的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則主要為科學家/發明家，佔51.90%，另哲學家／教育家佔提名的14.70%。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比照表一中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兩地學生皆主要視本國政治家為創造力的代表人物，而外國科學家為他國創造力的代表人物；香港學生對藝術家的提名依舊遠超於內地學生。

在表四，四地大學生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前十位提名中，政治家依舊明顯佔主導地位，其次為藝術家及科學家。就美國學生而言，甘地、愛恩斯坦、希特勒、曼迪拉、邱吉爾等人是外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就德國學生而言，畢卡索、達里、達芬奇、莫札特等藝術家是外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就中國兩地學生而言，愛恩斯坦、愛迪生、牛頓、比爾·蓋茨等人同被視為外國創造力的代表人物。特別的，內地學生對具有業績顯著性特徵的人物總提名比例大於香港學生，分別為66.83%和45.72%，而香港學生也比內地學生多提名具有審美顯著性特徵的人物，如莎士比亞、莫札特。

有趣的是，在美國和德國學生心目中，絕少有中國人被提名為外國的創造力代表人物；而在中國學生中，有近一半被提名的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是美國人，另一半是歐洲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比爾·蓋茨是中國和德國學生心目中的創造力代表人物，卻不是美國學生心目中的創造力代表人物。

總之，在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上，本研究的假設一在德國學生樣本中得到了部分驗證，而假設二則得了充分的驗證。

## 結果討論

### 研究結果的討論

本項研究發現，中、美、德三國大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存在著明顯區別。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內地，就中國大學生而言，對本國和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上，他們大多提名政界與學界的傑出人物而絕少提名藝術界與文學界的傑出人物，從而有力地驗證了筆者以往的研究發現。這表明，中國大學生在提名創造力代表人物

表四 四地大學生最多提名首十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對比

	Gressen(德國) (n = 166)			Mankato(美國) (n = 161)			香港 (n = 128)			南京(內地) (n = 143)		
	排名	百分比	姓名	排名	百分比	姓名	排名	百分比	姓名	排名	百分比	姓名
甘地	4	4.55%	甘地	1	10.75%	愛迪生	1	13.02%	愛迪生	1	21.09%	愛迪生
比爾·蓋茨	8	2.73%	愛因斯坦	2	9.68%	愛因斯坦	2	11.36%	愛因斯坦	2	12.80%	愛因斯坦
居禮夫人	8	2.73%	希特勒	3	9.32%	牛頓	3	8.31%	牛頓	3	9.48%	牛頓
業	—	—	曼德拉	4	7.89%	比爾·蓋茨	4	5.82%	馬克思	4	8.53%	馬克思
績	—	—	邱吉爾	5	5.02%	萊特兄弟	6	2.50%	比爾·蓋茨	5	6.40%	比爾·蓋茨
顯	—	—	戴安娜	5	4.30%	佛洛伊德	7	2.49%	拿破崙	6	2.84%	拿破崙
著	—	—	哥倫布	7	3.94%	希特勒	8	2.22%	居禮夫人	7	2.37%	居禮夫人
性	—	—	德蘭修女	8	2.87%	—	—	—	達爾文	9	1.66%	達爾文
	—	—	教宗	10	2.15%	—	—	—	林肯	9	1.66%	林肯
總數		10.01%			55.92%			45.72%			66.83%	
畢卡索	1	7.05%	約翰·連儂	8	2.87%	莎士比亞	5	2.77%	貝多芬	8	2.13%	貝多芬
德里	2	5.23%	—	—	莫札特	8	2.22%	—	—	—	—	—
達·文西	3	4.77%	—	—	貝多芬	8	2.22%	—	—	—	—	—
莫札特	4	4.55%	—	—	—	—	—	—	—	—	—	—
莎士比亞	6	3.64%	—	—	—	—	—	—	—	—	—	—
百水	7	3.18%	—	—	—	—	—	—	—	—	—	—
梵高	10	2.50%	—	—	—	—	—	—	—	—	—	—
總數		30.92%			2.87%			7.21%			2.13%	

註：表中的百分比數是按總百分比數來計算的。

時，的確十分看重提名者的業績顯著性。它還表明，中國大學生易將創造力與個人的治國能力與成就結合在一起，體現出以實用性為核心價值（*utilitarian orientation*）的認知範式。我們還發現，這種視政治才能和社會影響力為創造力突出表現的現象在內地學生的提名中尤為明顯，內地學生對政治人物和科學家的關注程度明顯高於香港學生，而香港學生較之內地學生會更多地關注具有審美顯著性的人物為創造力的代表。這種差距可以歸結為香港社會較內地社會更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換言之，處於中西文化交集地的香港，其大學生較之於內地更多受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表現出一種多元化的選擇傾向；而南京地處內地，其大學生的價值觀仍深受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及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影響，政治領袖和模範在中小學教育體系中一直被塑造為榜樣學習的典範以及學習人物的理想代表。到了大學，伴隨著青少年自身的心智發展以及學習環境的改變，內地大學生也更多地把目光焦點投向政治領域，表現出一種單一化的選擇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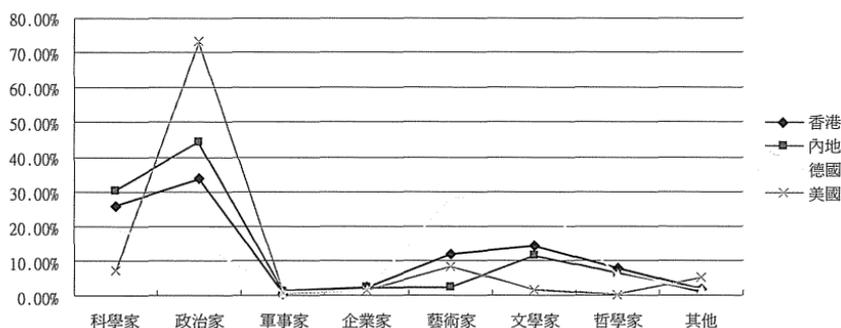
就德國大學生而言，在本國和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評價上，他們大多提名藝術界與思想界的傑出人物，並不大提名政界的傑出人物。這表明，德國大學生在提名創造力代表人物時，的確頗為看重提名者的審美顯著性。它也表明，德國大學生易將創造力與個人的獨創能力及其突出表現結合在一起。這種重視創造力本源的表現似乎離不開德國本身的國家特性，德國一直都以「思想者和詩人的樂園」（*Das 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而著名（Hohendahl, 1989），誕生了一批諸如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家，歌德、席勒為代表的文學家，貝多芬、巴哈為代表的音樂家。由此，藝術、美學、哲學在德國人心目中佔有崇高的地位，德國大學生也秉承這種特性，視上述領域具有突出個性特徵與獨創表現的人物為創造力的傑出代表。

就美國大學生而言，對本國和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上，他們大量提名了政界的傑出人物，比例高達73.20%（本國人）和39.40%（外國人），其中有很大比例是人權鬥士（如馬丁·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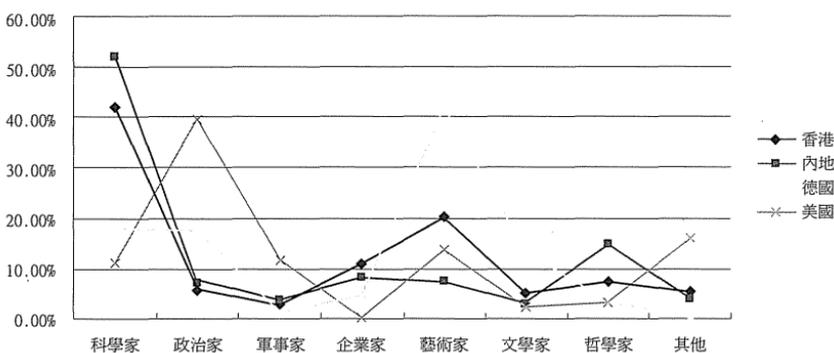
金、甘地等)。這似乎表明，美國大學生易將創造力與個人的政治信仰、個人操守與社會成就結合在一起。這一點，與本文所提出的西方人甚看重審美顯著性的假設一不相一致。這背後的原因，除了與後文研究方法中所討論的抽樣地區和樣本大小有關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本身的政治理念。美國的政治文化有別於歐洲，因為它是「新教主義、原住民、非洲黑人奴役和移民共同融合的結果」（Amin, 2003）。在他們的核心價值中，「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人權思想一直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這種政治遺產培育了美國人對那些倡導和捍衛民權運動人士的欣賞。

在圖二和圖三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這種差異。無論是對本國還是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中國學生都體現出重視具

圖二 四地大學生提名本國創造力代表人物類型對比



圖三 四地大學生提名外國創造力代表人物類型對比



有社會影響力的政治家和科學家，忽視文學家和藝術家的趨勢；而德國學生普遍看重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創新力表現，和中國學生對創造力人物提名的曲線圖呈相反的走勢；美國學生較多的將創造力與政治明星相聯繫。這種直觀的對比充分說明了，對於誰最有創造力這個問題，業績顯著性和審美顯著性的認知模式在各自的文化形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在中國，尤其是內地，良好品德的培養是創造力培養的一個重要條件（查子秀，1994），在中小學教育中，老師是不會鼓勵學生去開發那些為社會公德所不容的創造力（Chan, 1997）。因此，在提名並判斷創造力代表人物時，會受到某種「業績評估偏向」的影響，這導致人們在判斷創新成果及其代表人物的價值和意義時，重實用性而不重獨創性，重社會影響而不重個體表現，凡事均以對社會的貢獻和影響大小來衡量其價值和用途。其結果是對社會貢獻越大的創新成果就越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對社會影響越大的創造力人物就越容易受到人們的尊重。在西方，創造力多與藝術上的成就和創新結合在一起，體現出一種審美顯著性判斷，這與當今社會追求多元化、個體化的發展趨勢是相適應的，有利於激發和調動人們原有的創造力潛力。

這種東方實用主義認知範式與西方社會甚看重創造力之多元表現形式的文化傳統有著顯著差異。現代教育應使學生懂得，每個人都有其與生俱來的個性與專長，只有積極地加以開發和利用，才能使人的生活過得更加美好和充實。在這層意義上講，不斷認識和開發個人潛能，才是現代教育的根本目標和意義之所在（岳曉東、龔放，1999）。由此，唯有當我們走出「業績評估偏向」的認識誤區，我們才能開創教育的新局面，使每個人都能充分認識到其無限的創造力潛能，並充分地加以開發和利用（岳曉東，2000b；龔放、岳曉東，2000）。

## 研究方法的討論

就方法論而言，本研究嘗試以提名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不同文化對創

造力代表人物的認知差異，不啻為對跨文化研究的一次最初嘗試。本研究還對開放式問卷收集到的資料進行了較為客觀和系統的量化處理，比如將提名原因聚合分析，以作歸類審美顯著性／業績顯著性的判斷基礎，這是對有效處理開放式問卷資料的一次有益嘗試，值得在今後的研究中不斷應用和改進。在這當中，人們可以採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來對結論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

本研究尚存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如取樣規模不夠大、範圍僅限於一所大學的大學生群體、男女比例不完全對等等問題。特別需要指出的有兩點，一是本研究方法趨於簡單，只是採取了基本的提名分析方法，統計學的深入驗證較為缺乏；二是由於本研究屬於非隨機抽樣，因此樣本的選取會對部分結果有偏差影響。比如在本研究中所發現的美國學生對政治明星的高提名，是否只是抽樣地區的一個特別現象？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化多種族的國度裏，是否其他州的美國大學生也視政治人物和人權領袖為創造力的代表人物？審美顯著性作用於創造力代表人物的判斷是否會適用於美國其他地區？審美顯著性和業績顯著性是否在此存在著相互作用？這些，都值得作進一步的核對總和比較。所以，在今後的比較研究中，特別是跨文化比較研究中，人們應當儘量擴大取樣的範圍和比例，選取不同文化地區中有代表性的樣本，以使研究得出的結果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指導意義。

此外，針對美國學生對創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多集中在本國政治明星上這一有趣發現，其背後社會文化因素的深入探討應該成為今後的研究方向之一。另外，今後的研究還可以深入分析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人（bi-cultural individual）對創造力的思維認知，相信這將會大大促進我們對該問題的瞭解和認識。最後，從研究意義上來說，本文最大的價值莫過於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文化和創造力認知關係以及業績顯著性和審美顯著性之偏重差異的關注，並就其成因做作深入的研究。

## 鳴謝

本文作者感謝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委員會為本研究撥款(Project No. 9360106)。

## 參考文獻

- 岳曉東(2000a)。〈古今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代表人物：京、穗、港和台北四地大學生的調查及其思考〉。《教育曙光》，第42期，頁30-38。
- 岳曉東(2000b)。〈批判思維的形成與培養：西方教育的時間及對我們的啟示〉。《高等教育研究》(大陸)，2000年第8期，頁65-69。
- 岳曉東、梁覺(2003)。〈港、穗大學生創新價值之調查分析〉。《教育新曙光》，第47期，頁1-5。
- 岳曉東、賀國強(2002)。〈香港中小學教師的「業績評估偏向」對選擇創造力代表人物之調查分析〉。《教育曙光》，第45期，頁28-33。
- 岳曉東、龔放(1999)。〈創新思維的形成與創造性人才的培養〉。《教育研究》(大陸)，1999年第10期，頁9-16。
- 查子秀(1994)。〈超常兒童心理學研究與教育十五年回顧〉，《心理學報》，1994年第4期，頁338-346。
- 楊中芳(1999)。〈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概念化〉。《本土心理學研究》，第12期，頁105-180。
- 楊國樞(1981)。〈中國人的性格和行為：行為和蛻變〉。《中華心理學刊》，第23卷第1期，頁39-55。
- 龔放、岳曉東(2000)。〈強化問題意識，造就創新人才〉。《高等教育研究》(大陸)，2000年第1期，頁57-61。
- Amabile, T. M. (1996)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Oxford: Westview Press.
- Amin, S. (2003). The American Ideology. *Al Ahram Weekly*, 15-21 May.
- Averill, J. R., Chon, K. K., & Hahn, D. W. (2001). Emotions and creativity: East and We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 165-184.
- Baer, J. (1997). *Creative teachers, creative students*. Needham Height, MA: Allyn & Bacon.

- Chan, J. (1997). Creativity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n J. Chan, R. Li, & J. Spinks (Eds.), *Maximizing potential: Lengthen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stride.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World Conference on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pp. 212–218).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 Cropley, A. E. (1992). *More ways than one: Fostering creativity*.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 Csikszentmihalyi, M. (1999).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15–3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son, R. (1988).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In K. Gronhaug & G. Kaufmann (Eds.), *Innovation: A cros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29–64). Oslo, Norway: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 Hohendahl, P. E. (1989).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ase of Germany, 1830–187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su, F. L. K. (1981).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3rd edi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Jellen, H. G., & Urban, K. (1989). Assessing creative potential worldwide: The first cross-cultural application of the Test for Creative Thinking-Drawing Production (TCP-DP).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6, 78–86.
- Li, J. (1997). Creativity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omain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0, 107–132.
- Lubart, T. I. (1999). Creativity across cultures.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39–3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dwig, A. M. (1992).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46(3), 454–469.
- Mayer, R. E. (1999). Fifty years of creativity research.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449–4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g, A. K. (2001). *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 Ripple, R. (1989). Ordinary creativit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4, 189–202.
- Rudowicz, E. (2003). Creativity and culture: A two way interac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7, 273–290.
- Rudowicz, E., & Hui, A. (1997). The creativity personality: Hong Kong perspective.

-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2(1), 139–157.
- Rudowicz, E., & Yue, X. D. (2000). Concepts of creativit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Hong Kong, Mainland and Taiwanese Chines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34(3), 175–192.
- Runco, M. A., & Bahleda, M. D. (1987). Implicit theories of artistic, scientific and everyday creativity.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 93–98.
- Smith, C. D., & Wright, L. (2000). Perceptions of Genius: Einstein, lesser mortals and shooting star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34(3), 151–164.
- Sternberg, R. J. (198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wisdo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607–627.
- Sternberg, R. J., & Lubart, T. I. (1999).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Prospects and paradigms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karz, A., Beauvale, A., Zyla, K., & Rudowicz, E. U. (2004, Jun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mportant for a Pole as perceived by Polish students: Is there a place for creativ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ugustow, Poland.
- Weiner, R. P. (2000). *Creativity and beyon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Wu, W. T. (1996). Many faces of creativity. In S. Cho, J. H. Moon, & J. O. Park (Eds.),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3r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 (pp. 123–128). Seoul, Korea.
- Yue, X. D. (2003). Meritorious attribution bias: How Chinese undergraduates perceive Chinese and foreign creator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37, 88–104.
- Yue, X. D. (2004). Whoever is influential is creative: How Chinese undergraduates choose creative people in Chinese societ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94, 1235–1249.
- Yue, X. D., & Rudowicz, E. (2002). Perception of the most creative Chinese by undergraduates in Beijing,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Taipei.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36, 88–104.

## Who Are the Most Creative? — Views From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Germany and the U.S.

Xiaodong Yue

### **Abstract**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creativity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in the West in that the former is collectivism-based and emphasizes meritorious salience of creativity while the latter is individualism-based and emphasizes aesthetic salience of creativity. In this research, undergraduates from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regarded politicians and scientists, both local and overseas figures, as representative of creative persons and they rarely nominated artists, musicians and businessmen. Politicians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ts were also highly prevalent in American students' selection for creative people while artists and writers were mostly nominated by German students, followed by scientists and politicians.*